

# 敦煌 民间结社研究

Dunhuang Minjian Jieshe Yanjiu

孟宪实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# 敦煌 民间结社研究

Dunhuang Minjian Jieshe Yanjiu

孟宪实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敦煌民间结社研究/孟宪实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9. 4  
ISBN 978-7-301-15054-2

I. 敦… II. 孟… III. 敦煌(历史地名)-社会团体-研究-唐代  
IV. K242.07 K87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2594 号

书 名：敦煌民间结社研究

著作责任者：孟宪实 著

责任编辑：张 晗

封面设计：奇文云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301-15054-2/K · 0586

出版发行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址：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：[pkuwsz@yahoo.com.cn](mailto:pkuwsz@yahoo.com.cn)

电话：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16 开本 30.75 印张 470 千字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000

定 价：55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：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敦

煌

民

間

結

社

研

究

丁巳年夏  
翁同龢



# 序

刘泽华

辛亥革命前，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，曾经发生过大辩论。康有为、梁启超坚持君主立宪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坚持民主共和。梁启超其实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民主共和，他认为：现实的中国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，而“民智未开”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。他说：“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”，“既缺乏自治之习惯”，“又不识团体之公益”，如果实行民主共和，必然危机重重，“民无宁岁”，而最后仍归于专制（《开明专制论》）。民主制度在中国近代屡遭挫折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。分析个中原因，包括未来走向，虽众说纷纭，但是，“民智未开”说自梁启超以来就屹立不动，成为主张民主者必须面对的高山峻岭。

即是主张民主共和的孙中山，在他的言论中似乎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，即中国人民知识不足。先生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，固无可隐讳者也。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，深中乎人。诚有比于美国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。”“而中国四万万之人民，由远祖初生以来，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，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、不敢为主人、不能为主人者。”（《建国方略》）所以，革命派主张一边革命一边开发民智，这与后来设置的训政期有着直接的联系，其隐约的前提是认可“民智未开”说的。应该承认，无论是立宪派还是共和派，都在努力地探讨着、推进着问题的解决。真正把“民智未开”当作宪政不能立刻执行理由的是清政府。1906年

9月1日，慈禧公布《仿行立宪上谕》，强调实行立宪条件尚不具备，其中就有“民智未开”一项。

对于所谓的“民智未开”说，鲁迅先生的见解别有洞天。他说：“小民虽然不学，见事也许不明，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，何尝不会团结。先前有跪香、民变、造反，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，他们的像沙，是被统治者‘治’成功的，用文言来说，就是‘治绩’。”（《沙》）“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、不明史法……但能从大概上看，明黑白，辨是非，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。”（《“题未定”草》）鲁迅的观点与“民智未开”说形成鲜明的对立，他认为小民的见识在基本问题上常常高过自以为是的士大夫。退一步，即使有的时候百姓如沙一样散漫，那也是统治者治理的结果。

其实，民主的本质是权利问题，跟心智没多大关系。以世界范围内的普选权为例，当初不给黑人选举权，就有类似的心智不足之说，不给妇女选举权，也有所谓见识短浅的说辞。在中国，不管古代还是近代，当不想与民分享权利时，就说百姓“愚昧”，大讲“民智未开”，其实这不过是垄断权利的老生常谈而已。

民主的原动力是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，与之相反，专制的原发性则来自对他人权益的侵占。为什么说老百姓是天然的民主派？其根源就在于他们的权益总受到有权有势者的侵害。这里不是说民主体制的建设、程序、运作等等，这些与民主的原动力不在一个层面上，这里只是说民主的原动力主要来自受损害的人群和社会的弱势群体。而靠专制占便宜的人绝对不会成为民主的原动力。至于什么是正当权益？这应该是一个历史问题，而不应由抽象理论的逻辑来确定。墨子说：“衣食者，人之生利也”（《墨子》卷六），那么争取衣食之利就是民主的内容；更早的哲人说：“口之宣言也”（《国语》卷一《周语》上），争取言论权就是民主的要求，凡此等等，只能另论。总之民主随着历史的演进，其内容不断发展。在我们的传统里，有一种理论：圣人、圣王把所有人的权益都代表了，这是一种很美的说教，其实正是这一理论助长了专制主义。权益是很具体的，而具体的权利是别人无法代表的。把皇帝老爷说成父母，其背后一定是对老百姓的占有与剥夺。我再重复一下，民主的原动力就是来自民众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与合适的生存空间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受损害的下层是天然的民主

派。

影响巨大的“民智未开”说的论证方式是举证式的，而社会万象，什么样的具体事例都可以找到，可见这种举证方式的不合逻辑。要反驳“民智未开”说，从学理上并不难。在逻辑论证的同时，也需要历史论证。本书的意义就在这里。唐宋时期的敦煌民间结社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民主的历史试验场：在百姓确实拥有决定权的时候，他们很自然地利用民主的方式运行结社。

中国古代民间结社有很悠久的传统，但史官系统却很少记载，幸亏敦煌藏经洞让敦煌民间结社的资料保存下来，让我们在熟悉的政治史之外，了解到了社会更普遍的情况。可贵的是，孟宪实的著作特别关注民间结社的内部构造及其权力运作这一问题，他总结的几点很值得重视。在民间结社中，全体社人大会是最有权力的，也是最高权力的运作方式。制定章程、修改章程，决定接纳或开除成员，都要社员大会决定。结社的章程（社条）是最受尊重的，任何人没有超越社条的权力。社人是平等的，结社的领导人（三官）是选举产生的，他们在社条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组织工作。结社内部各种帐目是公开的，所以没有办法黑箱操作。民间结社是自愿前提下的民间组织，章程是共同制定共同遵守，结社的目的是通过组织互助，解决大家都会遇到的生活困难。

虽然是民间结社，但却显现出了十分健康的理性精神。难道当时的敦煌人，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吗？回答是否定的。从孟宪实的书中我们看到，当时的敦煌，能读会写的人是很少的，有的僧人就专门从事书写工作，且对社会开放。在需要当事人签名的时候，很多参与民间结社的人，他们因不识字，要么照猫画虎一笔一笔地画出自己的名字，要么请人代写。就是这样的文化水准，却没有妨碍结社组织良好地运行。行之有效的结社规则被代代相传，一种叫做社条文样的文书，会被完好妥善地保存着，为的是让结社的人们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样板。他们有各种结社的实用文书，并有比较完善的档案保管办法。林林总总，令人刮目。

本书虽取材于敦煌资料，但讨论的问题决不限于敦煌一域，在中国古代是具有普遍意义的。很多具体论证都十分有趣，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。让我最感兴趣的，还是那些缺少文化教育的“愚氓”，他们在力所能

及的范围内建立的组织恰好就是民主的原发式样。这让我更真切地意识到，百姓就是天然的民主派。

敦煌藏经洞大约在公元 1006 年被封闭起来，直到 1900 年重新被发现。这些古代写本文献所含有的历史信息，有许多是前人未曾注意的，本书所论证的民间社会民主传统，在以往的研究中，就被忽视了。孟宪实的研究让人感到很新鲜，同时也证明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研究方向。可以肯定，如此这般有价值的信息，应该还有很多等待发掘。

孟宪实同志三十年前入读南开，我给他们授过中国政治思想史。他爱好诗词，参加文学社，思想开放，爱动脑筋，经常提些通古今的刁钻问题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年少活泼的形象至今在我眼前晃动。他是黑龙江的铁汉，毕业时却奔赴新疆，该有多少浪漫！后来读北大的硕士、博士，2001 年，他重回南开做博士后，选择了我这个敦煌学的门外汉做他的合作导师，好在他的课题与政治思想沾点边。本书就是在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。我希望他今后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学术界。

是为序。

# 目 录

序	.....	刘泽华(1)
导 言	.....	(1)

## 第一编 结构功能研究篇

<b>第一章 敦煌民间结社的组织结构</b>	.....	(27)
一 社人大会地位最高	.....	(28)
二 社条为社内行为的最高准则	.....	(32)
三 社人平等原则	.....	(35)
四 社务公开原则	.....	(38)
<b>第二章 敦煌民间结社的功能</b>	.....	(41)
一 一般概况	.....	(41)
二 结社抗灾	.....	(43)
三 民间社仓	.....	(50)
四 附论:隋唐时期的社仓制度	.....	(59)
<b>第三章 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</b>	.....	(65)
一 官社与私社	.....	(66)
二 禁断与利用私社	.....	(68)
三 私社合法化	.....	(72)
<b>第四章 敦煌民间结社的分布</b>	.....	(77)

一 阶层分布 .....	(77)
二 空间分布 .....	(83)
三 社人集合地一览表 .....	(87)
<b>第五章 民间结社与社会秩序 .....</b>	<b>(94)</b>
一 民间结社诸功能 .....	(95)
二 社内组织与社人地位 .....	(100)
三 结社与社会互动 .....	(104)
四 政府的相关政策 .....	(109)
<b>第六章 民间结社与佛教寺院的关系 .....</b>	<b>(113)</b>
一 研究回顾 .....	(113)
二 关键资料 .....	(117)
三 契约关系 .....	(125)

## 第二编 文本研究篇

<b>第七章 社条 .....</b>	<b>(133)</b>
一 基本资料 .....	(133)
二 社条称谓 .....	(138)
三 社条的结构与内容 .....	(142)
四 社条的制定与修订 .....	(148)
五 社条的地位与作用 .....	(154)
<b>第八章 社条文样 .....</b>	<b>(159)</b>
一 基本资料 .....	(159)
二 文样的功能 .....	(169)
三 文样所反映的思想观念 .....	(176)

<b>第九章 社状社牒</b>	.....	(180)
一 基本资料	.....	(180)
二 投社状及其文样	.....	(185)
三 社内集体声明	.....	(191)
四 日常事务处理	.....	(198)
<b>第十章 转帖</b>	.....	(205)
一 转帖的一般种类	.....	(205)
二 转帖的相关规则	.....	(213)
三 作为处罚依据的转帖	.....	(222)
四 转帖的传递顺序	.....	(225)
五 转帖的广泛运用	.....	(230)
<b>第十一章 帐历</b>	.....	(235)
一 纳赠历	.....	(235)
二 社内帐务	.....	(244)

### 第三编 类型研究篇

<b>第十二章 成熟的敦煌民间结社</b>	.....	(257)
一 结社种类多样化	.....	(257)
二 规模与时限的多样化	.....	(261)
三 多样化之下的一致性	.....	(264)
<b>第十三章 唐宋时期敦煌的官人结社</b>	.....	(269)
一 敦煌结社的民间性质	.....	(269)
二 从《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》说起	.....	(271)
三 结社与赠纳	.....	(275)
四 官人社与传统政治思维	.....	(279)

第十四章 妇女结社 .....	(284)
一 资料与研究概况 .....	(284)
二 女人结社的具体功能 .....	(293)
三 女人社的经济问题 .....	(296)
四 性别界限的意义 .....	(299)
第十五章 渠人社 .....	(304)
一 基本资料 .....	(305)
二 渠人与官府 .....	(310)
三 渠人与渠社 .....	(319)
四 渠人溯源 .....	(332)
第十六章 亲情社与兄弟社 .....	(342)
一 基本资料 .....	(342)
二 成员构成 .....	(349)
三 亲戚结社及其意义 .....	(355)
附论 唐代西域的民间结社 .....	(363)
一 西州民间结社 .....	(363)
二 西州官社 .....	(369)
三 安西的民间结社 .....	(376)
附录一 两部重要的敦煌结社资料汇编 .....	(383)
附录二 郝春文《中古时期社邑研究》 .....	(390)
附录三 敦煌民间结社研究论著目录 .....	(400)
附录四 敦煌民间结社文献资料索引 .....	(410)
后记 .....	(481)

# 导 言

## 一 民间结社的悠久传统

传统中国社会，民间组织的存在其实是很普遍的。最常见的形式，就是围绕社来组织的。根据学者的研究，社的祭祀与崇拜，源远流长，围绕社神的祭祀，形成中国早期的土地神崇拜传统。不仅如此，血缘与地域性的结合，同时形成了基层社会的诸多特征。<sup>[1]</sup>这种看起来属于原始崇拜的传统，在后来的社会中依然有着广阔的生长空间，社神的功能向多个方向发展，但是基本的土地之神一直保存到后来。

作为基层社会的民间组织，社可以上溯到氏族社会中的氏族公社。《礼记·祭法》中有：“王为群姓立社，曰大社；王自为立社，曰王社；诸侯为百姓立社，曰国社；诸侯自为立社，曰侯社；大夫以下成群立社，曰置社。”孙诒让在《周礼正义》中主张：“王侯乡、遂、都、鄙之社，并为公社；置社则为私社。”<sup>[2]</sup>这种意义上的社，因为与祭祀联系在一起，具有很强的宗教因素，引起了研究中国早期宗教史学者的重视。至于其组织，上层的社则演变成国家祭祀礼仪的一部分，下层的社，则在战国时

[1] 参见守屋美都雄《社的研究》，《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》，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，1968年10月，第250—294页。

[2] 国学基本丛书本，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，第61页。不过，他在这里理解的私社仍然属于官社范围，与本文理解的私社全然不同。对此，本文同意宁可先生的观点，参见《汉代的社》的注释26，《文史》第九辑，第7—13页。

代转变成了国家的基层行政组织,宁可先生称之为“里、社合一制度”<sup>[1]</sup>。这个转变可能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的,李亚农先生认为这一过程是从西周时期就开始的,他说:“从西周前期开始,里和社(或称书社)已变成二而一,一而二的组织。”<sup>[2]</sup>据《春秋繁露·止雨篇》说:在需要的时候“令县、乡、里皆扫社。下县邑若丞令吏啬夫三人以上,祝一人;乡啬夫若吏三人以上,祝一人;里正、父老三人以上,祝一人。皆斋三日,各衣时衣,具豚一,黍盐美酒,财足祭社”。这些人所祭扫的社就是里社,属于最基层的官社。

随着帝国体制的发展,血缘因素在社会中的作用逐步降低,作为土地神的社神,成为联络社会基层的纽带,祈祷丰收、庆祝丰收与社会情感沟通联系在一起,看起来是人神关系,更重要的是体现人与人的关系。对此,在50、60年代的中国历史分期大讨论中各家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,注意的焦点各有侧重,但否认社的基层社会意义的一直属于少数。

在春秋战国时期,社会变动表现在各个方面。社会组织也突破王官一统,开始活跃起来。私学以孔子为代表异军突起,并带动了一个崭新的教育体制的发展。而就私学的组建方式而言,当然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组织。也许众多学派都有一些集团色彩,因为当时的学派多与私学有关,在一定程度上讲究内部的纪律,都可以看作是集团的存在方式。孔子率领他的弟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学说,浩浩荡荡的队伍,何尝不是集团。但是,无法否认的是,只有墨家的墨者集团拥有最突出的组织性。“墨者似为一组织极密、纪律极严之政治团体,对其领袖须绝对服从者。墨子当然为唯一之领袖。墨子死后,有巨子为其领袖。继任巨子之人,亦须由前任巨子指定之也。”<sup>[3]</sup>对于墨者集团性的认定,

[1] 宁可《述“社邑”》,《北京师范学院学报》,1985年第1期,第12—24页。

[2] 《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》第一章《中国古代的公社制度》,见《欣然斋史论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62年9月,第875—923页。

[3] 将伯潜《墨子及“墨者”》,载其《诸子通考》,1948年5月初版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85年2月重印,第201—224页。

研究者是没有异议的。我们甚至可以认为,在一定的意义上说,私学就是早期的士人结社的一种方式。不过,因为即使是私学也与政治组织存在着内部的逻辑联系,学而优则仕是多数学派的共同选择。私学组织的政府化,因此成为必然趋势。国家主办的学校取代私学成为教育的主流,私人讲学在社会上发挥补充作用,这成为秦汉以后教育制度的基本格局。

也是在秦汉时期,帝国体制膨胀发展,社会基层的社几乎成为乡里行政体系的一部分,当时多称之为“里社”。帝国把社会基层的社纳入帝国体制之内的努力颇有成效,但是,因为国家并不对这部分有足够的投入,也不干预其中的组织形式,所以在后世学者看来,民间自治的意味依然很强。

在这一过程中,民间又出现了“私社”,一种不为政府承认、民间自发性的组织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中之下的记载“建昭五年,兗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立社。山阳橐茅乡,社有大槐树,吏伐断之。其夜,树复立其故处。”张晏曰:“民间三月九月又社,号曰私社。”臣瓚曰:“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,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,是私社。”师古曰:“瓚说是。”看起来,张晏和臣瓚的说法有所不同,所以师古表示赞同臣瓚的意见。建昭,是西汉元帝的年号,五年是公元前 34 年。这是关于汉代存在民间结社的最重要文献记载。兗州刺史禁私社,说明至少此前已经存在民间的私社。臣瓚把私社解释为田社,说明私社是属于生产互助组织性质。这种私社当然就是民间结社。最晚从此以后,关于社就存在两个系统,一是官方的各级社,以祭祀社稷为最高,然后按照行政等级逐级设置的社,合法的并纳入国家礼典的社,这可以称作官社;一是民间的私社,存在于官方系统之外,自发自足自为的民间组织。

1980 年出土于河南偃师的《侍廷里憲约束石券》。为了充分利用这个难得资料,现全文过录于此:

1. 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,侍廷里父老、憲祭尊
2. 于季、主疏左巨等廿五人,共为约束石券。里治中
3. 遣以永平十五年六月其造憲,敛钱共六万

4. 一千五百，买田八十二亩。俾中其有訾次
5. 当给里父老者，共以容田借与，得收田
6. 上毛物谷实自给。即訾下不中，还田
7. 转与当为父老者，传后子孙以为常。
8. 其有物故，得传后代户者一人。即俾
9. 中皆訾下不中父老，季、巨等共假贷
10. 田也。如约束。单侯、单子阳、尹伯通、錡中都、周平、周兰、
11. □□、周伟、于中山、于中程、于季、于孝卿、于程、于伯先、于孝，
12. 左巨、单力、于稚、錡初卿、左中文、于思、錡季卿、尹太孙、于伯和、尹明功。<sup>[1]</sup>

这是现在所见最早的一个民间结社的社约，文中称之为“约束”，相当于后来敦煌资料中的社条。在敦煌，结社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制定社条，从这个资料来看，这个传统来源久远。不仅如此，社约的基本内容也十分一致，时间、结社的目的与活动、参加者署名等无一不具。从约束的具体内容中，我们知道这个民间结社在永平十五年（72）就已经开始，五年之后的这个约束是重新建立的，或是更改原来的旧章，或是重申约定。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注意的。其一，参加者属于自愿，“共为约束石券”字样和后文的署名就是证明。约束中的内容是大家（署名的二十五人）共同制定并共同遵守的，刊诸石刻的外在形式也具有当然的约束力。这些成员属于同一地域，即侍廷里的居民，彼此应该是熟悉的人，相信也有一定的亲和性，不然的话，组成这样自愿的社团

[1] 《文物》1982年12月，参考俞伟超先生录文，《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——论先秦两汉的单一俾一譚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10月，第114—115页。对于这个单的性质，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民间结社。参见宁可《关于〈汉侍延里父老俾买田约束石券〉》，《文物》1982年12期，第21—27页。邢义田《漢侍延里父老俾買田約束石券再議——兼與俞偉超先生商榷》，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61卷，3期，1990年，第761—782页。

是不可想象的。但是，并不是所有侍廷里的居民都参加了这个结社。<sup>[1]</sup>

其二，结社的目的是经济互助。他们共同收买了八十二亩土地，用以支持充当里父老的成员，如果没有人充当里父老，那么这些土地归大家共有，即所谓“即俾中皆訾下不中父老，季、巨等共假赁田也”。资助成员中担任里父老的人，这是购田结社的目的，同时说明，担任里父老是一种对个人而言负担较重的差事。因为买地的钱是大家共同筹集的，平均每人 2460 钱，所以大家都应该有受惠的机会，也就是说大家都有充当里父老的机会。

汉代的政府实行郡县制，县下设乡里，里是汉代政权的最基层组织。充当里父老，实际上是政府差役的一种。从这个约束来看，充当里父老，并不是什么美差，所以才有组织起来共同协助的行动。在这里，我们更重视的是这个早期民间结社就已经存在公共积累，意义虽然不在于防灾，但公差也是一项重大负担，所以才有如此行为。为了对付共同的问题，当个人的力量无法应对的时候，组织起来就成了很理性的行动。应付日常困难的这类经验，很容易发展出减灾救灾的组织功能。

有一份政治史资料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人们对民间结社的看法。东汉灵帝建宁二年（169），在宦官发动的第二次党锢之祸中，中常侍侯览与士大夫张俭为敌，指使张俭同乡朱并上书告发张俭，罪名是“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，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”，具体行为就有“刻石立碑，共为部党”等罪状。<sup>[2]</sup> 根据《后汉书》的记录，这个告发者朱并，是一个同乡土林不齿之徒，因此他对同乡的士子怀恨在心。在跟宦官势力勾结上以后，就采用以上的办法陷害同乡。我们在这里重视的是他捏造的罪名。因为后来政府的法律宣判与告发的目的一致，虽然宦官势力是决定性的因素，但采用这样的告发方式和罪名捏造，一定符合某些已经存在的观念。历史记载认定张俭等人是被诬陷的，他们未必有“共为部党”的行为，但是张俭“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”和“刻石立碑”

[1] 俞伟超先生不重视这个差别，甚至里、俾并用。见上书，第 122 页。

[2] 《后汉书》卷六七《党锢列传》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第 2188 页。